

◎寂寞中的关注，关注中的忧郁，忧郁中的热烈。◎一个远离快乐与幸福的寂寞的书写者，一个忧伤的言说者。

坚持与抵抗

韩少功

何言宏 杨霞 著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评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何言宏 杨霞 著

坚持与抵抗：

韩少功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评传

刘芳 何言宏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持与抵抗:韩少功/何言宏,杨霞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评传)

ISBN 7-208-05746-X

I. 坚... II. ①何...②杨... III. 韩少功-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3631号

策 划 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鄢元华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评传 ·

坚持与抵抗:韩少功

何言宏 杨霞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81,000

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08-05746-X/K·1138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红色少年

童年 / 1

接班人 / 10

第二章 知青时代

下乡 / 19

“文革”中的写作 / 33

第三章 最初的创伤

学潮 / 42

早期的“文革记忆” / 47

见证者 / 52

文学，或世界的悖论 / 55

第四章 归去来

“杭州会议”与“寻根”运动 / 64

《爸爸爸》、《女女女》 / 73

回返与超越 / 84

第五章 南方的自由

南迁 / 92

《海南纪实》 / 96

主席 / 108

第六章 在《天涯》

改版《天涯》 / 115

“作家立场”和“新左派” / 129

第七章 与异域

译事 / 134

出访 / 143

异邦的光荣 / 154

第八章 人世间

人与事 / 158

世相 / 170

第九章 历史深处的逼问

危机时代的写作 / 180

历史记忆 / 184

精神创伤 / 193现实焦虑 / 198

第十章 《马桥词典》

“马桥风波” / 204

文本世界 / 217语言精神 / 227

第十一章 皈依与出击

皈依汨罗 / 234“《暗示》事件” / 246

第一章 红色少年

童年

1953年1月1日。湖南长沙。深夜。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韩家又添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是韩少功，一个小名叫四毛的孩子。

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各种各样的红色风暴接二连三地震动着这片辽阔的楚湘大地，并且随时可能改变着每一个人——以及这个家庭、这个新的生命的命运。

韩少功的父亲是个小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不过，到他父亲这一代，家族已经没落了。韩少功的父亲曾当过教师，后来投靠自己的老乡——一个国民党的将军，进了国民党军队，混到的最高职位是中校，韩父曾担任过抗日自卫大队的大队长。后来在派系斗争中，他那一派的人失势了，他投靠的那个人回到地方政府担任长沙市的市长，韩父本人也就跟着在长沙地方政府担任了一般官员，亦官亦商，业余弄点小生意。解放前夕，韩少功的父亲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一些地下活动。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非我等今天所能了解。据说那时的许多人都是这样，两边

都挂着。他甚至还曾经掩护过湖南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

长沙解放后，韩少功的父亲又参军了，这次是共产党的军队。而四毛出生之时，他所在的部队正在广西参加艰苦的剿匪战斗，不算贫穷的出身和不甚清白的历史给了韩父负罪般的压力，使他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到革命活动中。转业后，韩父进了湖南省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在那里教过《语文》、《唯物辩证法》、《毛泽东选集》，而教得最好的则是《毛泽东选集》。由于对革命有过一点功劳吧，加上韩父个人的胆小、谨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韩家也还算平安无事。当然，韩父的内心从未平静过。他每天都关注着报纸，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也许他明白，运动不断的后果将是什么，不然在后来，他不会自杀。

韩少功的母亲——这个毕业于北京的一家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也由于不断的生育和繁杂的家务而放弃公职，成了家庭妇女。这对一个出身大户人家、受过新文化熏陶的性格倔强的女性，不是轻松的选择，而是近乎割舍和自残的伤害。这种伤害日后慢慢演变成心理上的怨尤，并破坏着她的心情和健康。由此种种，可以推测，这个生育事件并不带有希望和期盼。因而父母对这个叫四毛的孩子并不可能给予太多的关注和栽培，以至于韩少功回忆起父母的影响，只记得母亲教他写过毛笔字——“她的毛笔字着实写得漂亮”；父亲让他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不让他看《红楼梦》。除此之外，实在想不起更多——“父亲给我的印象不深，因为他死时，我才十三四岁。”

除了父母,小时候对韩少功影响最深的恐怕是他的姑母了——一个曾经做过“坏蛋”老婆的独身女人。她自己没有孩子,但她把所有的爱心都给了四毛这些韩家的孩子。在极其困难的年月,她省吃俭用,总能像变魔术似的给四毛带来食品、带来惊喜和快乐。但是在那个火花闪亮的

大年夜,人造的阶级高墙阻隔了人本的亲情。她发现了韩家的反常,明白了韩家夫妇的为难。她流着泪,溜出本该属于她的温暖的家,穿过一条又一条街,回到该她“忏悔”的冷冰冰的处所枯坐。别人的欢乐就像夜空无数的花炮,像菊花、像火轮、像亮闪闪的宝石,像数不清的鱼儿在游动……,但寒夜中没有一束火花是为她而绽放的。在四毛的记忆中,那些火花慢慢拖着尾巴消失了,他在黑夜中找到了一双紧紧抓着床沿的粗糙的手——这双手随时会从他心中打捞出这个夜晚的记忆。

年过完了,哥哥姐姐们仍旧忙于各式各样进步的活动和行动。而韩少功是孤单的。

年幼的韩少功是处在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这是一个先天敏感而多思的孩子。他在这个家庭中，显得有点孤独。他得自己去寻找快乐。一阵奔跑，一支木枪，都使他感到说不出的兴奋，沉溺于毫无拘束的快乐中，燃烧着强烈的愿望。那时实在是没有什么玩具，四毛就常常玩蚂蚁。他用死了的苍蝇引来两个窝的蚂蚁，人为地导演了蚁群大战。看着蚂蚁们在混战中伤残死亡，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不由自主地唱出了电影里的战斗音乐为它们助威。其实，以后他会明白这种快乐是残忍的，他和它们一样都将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蚁群之间的争夺表面上看是为了生存，实际上正是在断绝生存的可能。他的《回声》、《爸爸爸》等作品是否正是延伸了这种领悟呢？

他是在一种苍白的感觉中去寻找快乐的，蓝天、远树、飞鸟、爬虫……渐渐地，他明白了，也许这就是童年。快乐是一种感觉，是意绪如游丝般爬上心头的好奇和迷惑。童年是一个可以抛开任何掩饰的本真阶段，原本苦涩、沉重、繁琐、动荡的生活，通过好奇、贪玩、淘气、任性和顽皮，一变而为激动、有趣、轻松的探险游戏，而不必像大人那样承担现

实的沉重与凶险。一切都听凭好奇的驱遣，兴起而作，兴尽而息。所以尽管有那么多现实的困顿，但仍然像现在一首歌中唱的那样——“阴晴圆缺在窗外，心中一片艳阳天”。他的童年还是快乐的，尽管灾难就要阴险地进入他的生活，终止他的快乐和纯真，终止他的童年。

——他的父亲死了！

1966年9月底的一天，韩少功和他在长沙第七中学的同学兴冲冲地从乡下支农回来，刚一进门，便发现家里的一切全都变了。

父亲死了。更准确地说法是父亲消失了——他留下极其简明的遗书，却见不到尸首。家人们从家里到单位到公安局，都在四处寻找。很多人都怀疑他是叛国外逃。

20多天后，人们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已经面目全非的中年男尸。根据衣着和体形，人们判定他就是韩少功的父亲。但对这些，韩少功似乎很难在感情上予以接受，于是父亲的死也似乎成了心里的疑案。在小说《鞋癖》里，他就做了这样的假设：父亲还活着，活在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湖南省干部教育委员会曾经搜罗了一批旧知识分子给工农干部学习文化。“文革”前，每次政治运动都要从这批旧知识分子中揪出一个阶级敌人。韩少功的父亲在“文革”前尚能自保，这已属万幸，但他心里很清楚，按照这种速度，很快就该轮到他上场了。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与革命口号中，他战栗着。

“文革”开始两个月后，机关里出现了关于韩少功父亲的大字报。整个安排看起来非常周密，先抛出他的一些历史材料，再说他有特务的嫌疑、血债的嫌疑等等。韩少功父亲所参与的革命终于革了他自己的命。

当生存的压力超过了人可以忍受的限度时，生命本身就变得毫无意

义了。尽管韩少功曾提到过父亲在政治上的谨小慎微,但他的父亲在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上,却做得相当果断,而且非常及时。后来发生的事情甚至证明他父亲的决定还很明智:先下手为强,韩父写下遗书,说自己有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韩少功的父亲实际上是让开了一条道路——让开了一条生路给他的家人。这篇遗言表明,至死他还是一个合格的父亲。然后,韩少功的父亲把自己投入湘江的水流,就像投掷石头一样,轻若鸿毛,又重似泰山。

这在韩少功的童年记忆中深深地重重地划上了一笔。在当时,一方面,他被灌输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的教导;另一方面,却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而被众多的亲戚和熟人所疏远,饱尝了初历人世的炎凉。父亲死后,哥哥姐姐们各谋出路,他和妈妈去投奔远在农场的姐姐。然而,农场却逼姐姐与他们决裂,于是,他和母亲又一次被抛入了茫茫生活的洪流中。那是一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韩少功平生记得的第一次大哭,就是发生在那时。恰如韩少功在后来所回忆的,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他对人性最初的痛感。苦难能使人堕落,也能使人成熟。苦难成了点燃四毛心中怀疑之火的引石。他降生以来最初、最强烈、最持久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痛感”,灰暗的、萦绕心头的,时而让他反抗,时而又让他屈从。然而,追随而至的生活还要教训他的不仅仅是“痛感”,还有源源不断的困惑。当然,生活拒绝告诉他现成的答案,或者说,即使生活告诉了他答案,也为他所怀疑。

“文革”时有一首很流行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这可以说是荒谬绝伦的“血统论”的“杰作”。但对韩少功而言,“血统论”所造成的切肤之痛,反而使他具有了理解、悲悯和承担苦难的心智。他看到了他的

学校的生活并没使他的精神或肉体轻松多少。他和他的同龄人参加过许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贫困的农民们捐过钱(尽管自己也吃不饱),以此来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但是在争论谁最革命的问题上,同学中的两派可以大打出手,甚至互掷手榴弹,即使已住进医院还要被拖出来痛打一顿。那时人们共同效忠并为之奉献的热情,互相疯狂告密、揭发的劲头比起现在人们对利欲的追逐毫不逊色;人们大力提倡对乡间农民的革命情感的时候,对自己身边的同学却毫无人道主义精神。

② 韩少功：《我家养鸡》，《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说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被饥饿所逼而逃荒他乡,更多的人被饿出水肿病——父亲就患了这种病。他脸色苍白,全身浮肿,用指头在他的肌肤上戳一下,戳出的一个小小肉窝,久久不能恢复原状。”^①

而 mereka 家从实验红薯藤粥的失败到吃饭“计划经济”的实施，都无法遏制住饥饿的逼迫。这之后，他们家不得已留起了“资本主义尾巴”——养了四只鸡。它们成了四毛的朋友。当他苦于为这些小动物找食时，家里人就整天议论着杀鸡的理由和鸡肉的营养价值。尽管他一次次大哭大闹地吼着：“不准杀鸡！”鸡还是一只只地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只生蛋最多的黄色母鸡——“为了让它生蛋，父亲以前在分饭时，总在锅里剩一口留给它，让它吃点精粮。后来，全家饿慌了，父亲就说：‘人还吃不饱，还管得上它！’于是就把它那一份口粮取消了。”韩少功觉得不忍心，每餐饭“都在自己的碗里留一口，去小院里拨给它”。②在一个人人都没饭吃的岁月，鸡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终于，有一天放学回家，他闻到了肉香却听不见鸡叫，于是伤心大哭。几块鸡肉被夹到他碗里，一餐又一餐，热了一次又一次，他还是没有去碰它。他在哭泣中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大人们是很坏的，而他终究也要变成大人，也会变坏。这个想法使他感到恐惧。

韩少功童年时代的这些事向我们显示了形成他性格的那种力量——爱心与怜悯、怀疑和恐惧，这使他长大之后能再次端坐在生命最初的种子中发掘人性的根本。

记忆中的这个事件孕育出了韩少功早期的一篇小说《月兰》和后来的散文《我家养鸡》。看完了稿件的编辑们在编辑室里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想,除了这件事本身所体现出的纯真童心和悲悯之情外,可能还

①② 韩少功：《我家养鸡》，《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在于引发了编辑们在那段时日里历经饥饿折磨的旧痛吧！

红色的海洋,当它风平浪静的时候,光彩四射,夺人眼眸,让人不由自主地奔涌出投身其中的激情和顶礼膜拜的虔诚。但哪个海洋深处不是暗涛汹涌呢?红色的怒涛一旦席卷而至,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也就在所难免了。和饥饿感一样,恐惧感与少年的韩少功如影随形。

在韩少功的回忆中，有一堵厚厚的高墙，布满了青苔。隔壁王家的父亲经常自杀，但每次都死不了，他的寻死对于韩少功来说，就像是生活中随时会有的叹息。夏夜里，一颗颗流星都落到西墙那边去，从那边，偶尔会飘来好听的琴声。那边，有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挥着一条女人的毛巾，“阿毛，拿洋火来——”四毛被吓坏了。韩少功的父亲非常生气，拿来竹篙和菜刀把疯子轰了下去。

韩少功的父亲最瞧不起墙那边的王家。有一次，四毛问他们姓什么？韩父就说：“屙吃困，剥削阶级都是屙吃困。”①还朝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手提琴）呢。”②在韩少功父亲的一再抗议下，疯子被送走了。从此墙那边静得出奇，四毛怀疑那边的人已死了很久很久。但他有一次挖蚁窝，在墙基上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才发现那边也有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簇拥着。“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我大吃一惊！”③

① 韩少功：《那年的高墙》，《西望茅草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这是韩父对他们表示轻蔑的说法，“屙吃困”就是指他们整天只知道“屙屎、吃饭、困觉”。

②③ 韩少功:《那年的高墙》,《西望茅草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小四毛和许多人一样生活在那年的高墙下，不同的只是，他在墙基下挖出了一条缝。他在后来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于隐秘的挑战和对规范的怀疑可能正源于此。

以后的岁月中，四毛惊奇地发现高墙无处不在，他发现威严的高墙横亘在人们之间，两边的人们隔膜着、猜疑着、伤害着。他们各有不无合理的动机，却又互相实施着伤害。更为荒谬的，则是受害者往往表现出与施害者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结构性的社会病相，这种冲突双方的互相复制和互相强化，是这堵厚墙的内在奥秘，也是“文革”重要的奥秘之一。但它在简单的道德批判中却一直成为盲点。韩少功要做的，就是要给这堵墙挖个洞，并且进一步推倒它。

除了饥饿,除了那堵阴郁的高墙,对少年时代韩少功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深刻影响的,还有一系列的恐怖和创伤。

他忘不了“那些曾经友善温和的面孔用大字报揭发”，最终导致了父亲的自杀。从此以后，他的母亲对人与对物便充满了一种神经质的疑惧。这种疑惧正是这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精神后遗症，而对这一精神病症的揭示与反思，正是韩少功文学写作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主题。

1967年的一天，韩少功经过一处街区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在他的大腿上留下了很深的伤口，血像温泉一样喷涌出来，把裤子和鞋都浸红了。扣扳机的人所瞄准的目标不是他（也许那个人根本就没有瞄准），这不过是一次突然发生的武斗所造成的误伤。正是这颗子弹的偶然性，使他领悟到在那样一个时代之中，个体生命所在的最为残酷的处境是——无辜。在历史的狂澜之中，“无辜”的个体生命一般会有两种基本的命运：要么是掉进时代的洪流，成为一个疯狂求生的溺水者；要么饱经沧桑，奋力搏击，成为“无辜者”的代言人。在此意义上，韩少功大概是他

所属的那一代精神上的代言人了。当然，更多的人则是介于二者之间，他们生存在一种惰性积习与时世艰难之中，在接受并跟随（而不是怀疑和反抗）中形成了他们不经意的妥协，他们怯懦而卑琐，拘谨而恭顺。

接班人

他在激情和热闹的共和国中一天天成长起来，也从童年的懵懂伢子成长为一个富有激情的红色少年——“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宛如一株盲目而又执拗的牵牛藤，沿着高大的枝桠指向的路径向上攀援着自己纤细的卷须。

他的个头日渐看长了，幼稚的棱角反复被磨砺，随着身体的成长，自我的身影却缩小了。童年时代那些快乐的奔跑、有趣的游戏也渐次从他的生活中淡去，单一而强烈的红色教育将迎面扑来。“接班人”，这是一个为“立国”而“立人”的教育定位，从“五热爱”教育到准军事化的营连编制和教学管理，再到教材的频繁改变，一切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从而形成很明显的社会本位思想。这种国家主义教育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压抑了个体合理的需要，个体价值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甚至会受到蔑视和批判；但另一方面，使韩少功这样一代人的“社会本位”意识在日后并不会随着对于个人价值的归依而丧失。新时期以后，思想上拨乱反正了，这种社会本位思想被改造或升华为一种社会关怀、人文精神、国家主义及理想主义等，他们的精神深处社会本位思想枝繁叶茂，且生生不息，成为这一代人最为显著的精神气质。

“接班人”生活在典型的社会生活环境里，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大多是

在响应一系列伟大号召中度过的。一开始,号召还是以国家的名义发布的,后来代表国家的那个领导集团中的成员一个接着一个被打倒,号召逐渐变成了个人的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接班人”们对于领袖的无限忠诚使得这些指示可以在一瞬之间点燃他们的青春热血,使他们陷入痴迷的狂热。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深入了韩家。韩家的孩子们都成了红色的狂热分子。他们的灵魂里藏着一团火，一旦燃烧起来便不会熄灭，它的火焰将愈升愈高，愈烧愈猛。湖南当时有个著名的“八一九”运动，正在湖南大学读书的韩少功大姐就是那批造反的学生之一。当韩少功的父亲试图以父亲的口吻对孩子们说：“又是一个五七年来到了，你们要小心”时，大姐顿时就跟父亲吵得天翻地覆。韩父不让韩少功上街去看大字报，韩少功还怒斥他压制革命。孩子们都烦透了父母的劝说，吵架、摔打家具，人伦亲情一时已被政治关系压抑，韩父的尴尬可想而知了。然而，孩子们并没有觉察，作为彻底的革命者，他们不能保留并且蔑视一切私情，不能儿女情长挥不起意志的宝刀。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向往革命的红色“接班人”一样，1968年初，韩少功和一群中学生曾经想瞒着父母去新疆参加军垦。但那次“偷逃行为”并未得逞，最后他不得不在他卤莽的行动之后踩着自己的影子敲响了自家的大门。直到一年以后，他才在第二次规模更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得偿所愿了。

韩父的死断绝了韩家的经济命脉。尽管有国家的适当救助,但是韩家还是进入了十分困苦的时期。然而,孩子们并未丧失精神的支撑——因为当时有着代替父亲这个角色的对象——英明伟大的领袖、英勇无畏的英雄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模范人物等等。这些具有示范性质的典型榜样,似乎与他们理想中的父亲形象更为接近。这些代替父亲的“高大全”的幻象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中更容易被他们认可,并进一步去追